

我国留守家庭研究

Study on Family Left Behind
in China

周福林 著

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我国留守家庭研究

Study on Family Left Behind in China

周福林 著

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国留守家庭研究/周福林著. —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6.9
ISBN 7-81117-038-8

I. 我… II. 周… III. 家庭问题-研究-中国 IV. D66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56621号

书 名 我国留守家庭研究

作 者 周福林 著

策划编辑 魏秀云

责任编辑 魏秀云

封面设计 郑 川

责任校对 陈 莹

出版发行 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圆明园西路2号

邮政编码 100094

电 话 发行部 010-62731190,2620

读者服务部 010-62732336

编辑部 010-62732617,2618

出 版 部 010-62733440

网 址 <http://www.cau.edu.cn/caup>

E-mail caup@public.bta.net.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鑫卡华彩印有限公司

版 次 2006年9月第1版 2006年9月第1次印刷

规 格 787×980 16开本 9.75印张 180千字

印 数 1~2 100

定 价 22.00元

图书如有质量问题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序 一

欣闻周福林博士的博士论文将以专著的形式由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可喜可贺。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不断深入发展,人口流动也出现了空前未有的局面。尽管人口流动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但人们仍然对它的出现始料而不及,而往往冠之为“盲流”。但“盲流”不盲,人口流动表现出自身强烈的规律性,只是人们的认识往往滞后于形势的发展而已。据统计,我国目前的流动人口已达 1.4 亿。如此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将会证明是中国数以亿计的广大农民与千百年来的“乡土社会”彻底告别的根本之举。这种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不仅是市场经济发展之必然,而且也必将成为我国社会变革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它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推动之强烈,对中国社会变革的影响之深远,可能要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在中国从千百年的农业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变的过程中,风起云涌的人口流动也必然带来一系列的前所未有的社会问题,“留守家庭”问题就是其中的一个突出的问题。更进一步地说,它包含了留守儿童问题、留守妻子问题、留守丈夫问题、留守老人问题,等等。周福林博士提出,“留守家庭占家庭的比重,是城乡统筹发展水平的主要测度指标”,这是很有道理的。留守家庭存在比重较高的地方也是城乡统筹发展水平较低的地方,这大概是不错的。在呼吁加强城乡统筹发展的时候,留守家庭问题不能不引起我们更大的关注。

但就如我们对大规模人口流动的到来的认识滞后一样,我们对留守家庭问题的认识也出现了滞后的局面。在很长时期中,关于留守家庭包括留守儿童、留守妻子、留守丈夫、留守老人的关注还是停留在个案报道和现象描述上,这就使我们对留守家庭问题的认识往往缺乏整体性、系统性、规范性。周福林博士认识到这一研究的重要性,毅然以这一课题为他的博士论文的主题,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周福林博士选择以 2000 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为依据开展关于留守家庭问题的研究,就是为了弥补迄今为止在这方面的关注中“整体性、系统性、规范性”不足的缺陷。但是,要运用全国人口普查的资料来开展留守家庭的研究,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为此,他在先前关于留守家庭的研究,以及关于家庭转变理论与人口流动和迁移理论的基础上,根据学术规范,对留守家庭、留守儿童、留守妻子、留守丈夫和留守老人的概念进行了严格的鉴定,并对从 2000 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 0.95% 抽样资料中如何鉴别留守家庭、留守儿童、留守妻子、留守丈夫和留守老人在研究中分别进行了具体的讨论和交代,这就为他的研究的展开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

周福林博士在研究中对我国目前的由于人口流动和城乡二元化形成的留守家庭、留守儿童、留守妻子、留守丈夫和留守老人状况,包括他们的城乡分布、地区分布、年龄分布、性别分布、职业分布等从不同的角度分别进行了讨论,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关于留守家庭情况的全景式的报告,使人们能得到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

周福林博士的研究结果大大丰富了我们对于留守家庭问题的认识。我国目前留守家庭的规模、分布和涉及面大大超出了人们原来的了解。他的研究表明,我国目前的留守家庭已达7000万户,涉及2.4亿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近20%。其中,农村留守家庭占全部留守家庭的77%。留守家庭的出现对我国特别是农村的家庭规模和结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为此,他提出,“我国近年来家庭规模的变化,既受到生育水平降低、家庭结构变化等因素的影响,也受人口流动导致的家庭分离因素的影响。”

他的研究表明,由于父母外出而子女滞留家中的留守儿童已达2300万,其中农村占87%,农村2000万留守儿童成为留守儿童的主体。由于父母外出,留守儿童的成长难免受到影响,在校率下降、监护能力减弱,在农村尤其严重,应该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但,他的研究也表明,父母外出而让子女滞留家中实为无奈之举。留守儿童的存在与母亲的教育程度、外出时间、外出职业成反比,与母亲的外出距离成正比。

由于流动人口中以男性为主,当家庭化流动尚未成为人口流动的主要模式,随着已婚男性外出的增多,留守妻子的规模也必然呈上升的趋势。周福林博士的研究表明,目前我国留守妻子的规模已达上千万,是留守丈夫的2倍以上,其中农村占60%以上。这就不能不使农村出现了“劳动力女性化”的倾向。因此,他提出,农村留守妻子问题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研究中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也不能不影响到外出人口家庭的稳定和夫妇的生殖健康。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留守老人问题是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因为即便在实现人口流动家庭化的情况下,丈夫、妻子、子女会一起流动,老人却很可能仍然滞留在家中。这种情况在农村中将更为突出。当我们面临着人口快速老龄化的挑战的时候,由于人口流动的增长,越来越多的青年人离开农村走向城市。这就出现了虽然农村的生育水平比城市高,但农村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却比城市高的意想不到的情况。农村老人的孤独感、无助感在增强。正如周福林博士指出的,“由于子女的外出,留守老人比非留守老人更早地进入了空巢家庭、隔代家庭和单身留守家庭阶段”。

毫无疑义,留守家庭已经成为我国人口与社会转型时期的一种不可忽视的家

庭形态。周福林博士通过开发运用 2000 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对留守家庭问题作了一个全面的分析,提供了丰富的成果;同时,也为如何利用人口普查资料开展家庭人口学的研究开出了一条新路。周福林博士于 2002—2005 年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短短三年的博士研究生学习过程中,刻苦努力,不断进取,能够完成这样一个重要的研究,实属不易。我衷心希望,周福林博士的研究成果的出版能进一步推动人们对留守家庭问题的重视和对留守家庭问题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我相信,对于留守家庭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化,必将有利于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发展、人口城市化和和谐社会的建立。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出的是,虽然我当时是周福林的博士生导师,但由于我当时还承担着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副秘书长兼国际合作部部长的工作,对他的指导常常处于心有余力不足的状态。他的博士论文的完成,主要得力于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段成荣教授的悉心指点。段成荣教授是颇有造诣的人口流动与迁移问题的人口学专家,为周福林博士的学业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在周福林的博士论文正式出版之际,我愿借此机会向段成荣教授表示特别的感谢。博士论文的完成和博士学位的获得,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对于周福林博士来说,无论是人生还是学业的路还很长。我愿在此衷心祝愿周福林博士在今后能百尺竿头更高一尺,不断为探索我国人口变动的客观规律性和人口学在我国的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顾宝昌

2006 年 8 月于中关村

序 二

当前,我国人口流动十分活跃,从农村流动到城市的流动人口多达1亿以上。这些流动人口主要是年轻的劳动力人口。这些人流动外出以后,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产生了大量的留守家庭。

留守家庭的大量存在且日益增多,对我国农村地区乃至全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将产生重要的影响。比如,到2030年前后,我国老年人口数量预计将高达4亿左右,其中的70%左右将生活在农村。在年轻人普遍“缺位”的情况下,如此大规模的老年人口依靠谁、依靠什么来养老?这是一个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过分的重大问题,需要及早予以研究;与此同时,当大批成年人离开农村流动到城市时,很多人将他们的子女留给老年人照看,还有一部分人将孩子委托给其他亲属照看,有的年龄稍大的孩子甚至无人照看。这种状况,对于这些留守孩子的身体发育、知识学习、心理培养等都会产生重大影响,有时可能是非常不利的负面影响,这也是急需研究的问题;在流动人口尤其是远距离流动的流动人口中,男性占多数,这样,在农村地区就出现了大量留守妻子。当然,也有一部分因妻子外出流动而形成的留守丈夫。但从规模上看,留守妻子更多,也更受关注。一些留守妻子、留守丈夫正在受到夫妻分离、情感孤独、劳动负担加重、夫妻关系面临威胁等种种挑战。这些挑战,并不简单地是这些留守妻子、留守丈夫的私事,更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婚姻家庭关系的稳定,也是非常值得重视的问题。

无论是留守老人问题、留守孩子问题,还是留守妻子问题,都急需进行深入、系统地专门研究,进而提出有效解决相关问题的对策。这些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和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2004年6月,在由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和中国人口学会联合举办的“现代化进程中的人口迁移流动与城市化”全国学术研讨会上,应邀出席研讨会的各界代表大力呼吁学术界加强对留守家庭的调查研究。然而,除了一些零星的小范围调查以外,当时基本没有对留守家庭问题的系统研究,人们对留守家庭现象的认识和了解也十分有限。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周福林博士选择以“留守家庭研究”为题开展他的博士学位论文研究,这既反映了他能够及时抓住时代脉搏的学术敏锐性,也反映出他有勇闯难关的胆量——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在一个接近空白的领域内做出有份量的研究来,这毕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研究留守家庭,可以从多个不同的角度展开,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老年学、女性研究等不同的学科都可以对留守家庭做出各自的阐释。我个人的粗浅认识是,在我们对一个新出现的社会现象还缺乏了解的时候,从人口学角度开展研究往

往是基础性的,因为人口学研究所提供的规模、结构、分布等基本信息是认识社会现象的依据,也是进一步开展其他相关研究的起点。周福林博士对留守家庭的研究正是这样的研究。他通过对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深入分析,为我们提供了有关留守家庭的丰富信息:留守家庭的总量、留守家庭的地区和城乡分布、留守家庭的户规模和结构,留守儿童的规模、性别年龄结构、城乡和地区分布、受教育状况、家庭结构模式,以及留守妻子、留守丈夫、留守老人的规模、结构、分布、劳动参与,等等。这些信息,对于了解我国留守家庭的状况及存在的问题,对于进一步开展相关研究,无疑都是十分宝贵的,具有很高的学术和应用价值。

研究留守家庭现象,无论是研究留守儿童、留守老人,还是留守妻子,很不同于通常以单个个人为单位的研究。在后一类研究中,只要我们收集到个人的有关信息,研究即可展开。通过全国人口普查等各种调查得到的数据资料一般都能提供这类信息,因而能够较好地支持这类研究。但是,对留守家庭进行研究,其着眼点是家庭,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而不简单地是个人。这样一来,就不是所有的调查资料都能支持有关留守家庭的研究了。在近年来举办的各项全国性大型调查中,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结构特点使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对留守家庭的研究。周福林博士紧紧抓住这一特点,经过刻苦钻研,找到了运用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进行留守家庭关系“匹配”的突破口,实现了自己的研究初衷。这不仅为今后的留守家庭研究找到了一条新路,而且还为更充分有效地开发利用人口普查问卷中“与户主的关系”这一人口普查项目做出了十分有益的探索(该项目在1982年普查以后的历次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样调查中都有设置。但在数据分析阶段,该项目常常受到冷落,显得有些“多余”),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价值。

应该指出的是,留守家庭研究尚处在起步阶段,很多问题需要做更深入的探讨。周福林博士的这项研究主要依据的是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然而,该次人口普查数据本身的结构特点使得其用以揭示留守家庭不同侧面的效力是各不相同的。概括而言,该次人口普查数据可以比较“完整”地反映出留守儿童的情况,但在反映留守妻子或留守丈夫以及留守老人时则可能出现较大幅度的“遗漏”。这虽然是客观条件给研究者带来的遗憾,但它从另一个侧面也表明,关于留守家庭的研究的确天地广阔、大有可为。希望周福林能在这一领域更好地进取。也希望看到有更多的朋友能投入到关注广大留守家庭的行列中来。

段成荣

2006年8月6日于中国人民大学

前 言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家庭的教育功能、经济功能、情爱功能的正常发挥影响着家庭成员素质的提高和生活质量的高低。但是,在我国的社会转型过程中由于部分家庭成员外出而出现的大量留守家庭,却影响着留守儿童的成长、留守老人的养老和留守家庭的婚姻稳定与和谐。

自 1979 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我国开始进入了快速的社会转型和城市化过程。人口迁移流动程度不断提高,流动人口达到了空前的规模。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00 年 11 月 1 日我国流动人口总量为 10 229.8 万人,流动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为 8.08%。流动人口主要是以从农村流动到城市的青壮年劳动力,15~49 岁青壮年劳动适龄人口占流动人口的 69.9%。由此在很多人口流出比较集中的地区,出现了所谓人口结构的“386199”现象,也就是所谓的“留守家庭”问题。按照我国目前的不断增长的人口流动趋势和非家庭化的人口迁移流动模式,随着流动人口的规模的持续增长,留守家庭的数量也会随着增加。留守家庭问题已经引起了国内外的重视。2004 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纽约时报等对此进行了专题报道;教育部召开了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座谈会;《人口研究》编辑部举办了留守家庭问题的论坛。国家和社会各界急需了解我国留守家庭的基本状况,但目前的相关研究只有个案研究,无法反映我国留守家庭的基本数量特征。

我们将有外出人口的家庭称为留守家庭。留守家庭是人口流动过程中,由于部分家庭成员流出,部分家庭成员留在原居住地而形成的特殊家庭类型,是完整家庭分离后的一部分,它的对应部分是由外出成员形成的流动家庭。

在留守家庭中,需要特别关注的是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留守妻子和留守丈夫。留守儿童是生活在留守家庭中的父母双方外出或父母一方外出后居住在户籍地的年龄在 14 周岁及以下的人口。留守妻子是指生活在留守家庭中的丈夫外出的女性,即其丈夫为流动外出人口,本人还居住在原地(或户籍地)的已婚妇女。留守丈夫是指生活在留守家庭中的妻子外出的男性,即妻子为流动外出人口,本人还居住在原地(或户籍地)的已婚男性。留守老人是指生活在留守家庭中的 65 岁以上的人口。

本书关于留守家庭状况的研究,以 2000 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 0.95%抽样数据为基本依据。但以人记录形式存在的人口普查抽样数据无法直接用于留守家庭问题的研究。为了达到研究目的,我们以原始数据为依据,构造了户记录形式的人口普查抽样数据,该数据附加了家庭户的家庭结构等重要家庭信息。并以此为

基础派生出了留守儿童数据、留守妻子数据、留守丈夫数据、留守老人数据、夫妻配比数据、已婚妇女子女状况数据等。此外,为了对人口普查数据的背景进行认识,笔者还参加了多次与留守家庭相关的调查。

本书分为10章:1. 研究的意义与背景;2. 国内外关于留守家庭的研究;3. 概念与理论框架;4. 资料来源与研究方法;5. 我国留守家庭的家庭人口学研究;6. 我国留守儿童状况;7. 我国留守妻子和留守丈夫状况;8. 我国留守老人状况;9. 从家庭功能看留守家庭问题;10. 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对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我们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1. 留守家庭成为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重要家庭形式。留守家庭占全部家庭的近20%。留守家庭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转型时期的重要家庭形式。它可能比单亲家庭等不完整家庭对社会和个人的影响更深刻,更普遍。

2. 留守家庭的家庭结构明显的变异,家庭功能弱化。为了追求经济和社会利益,留守家庭的经济功能被强化。但重要家庭成员的缺位以及由此导致的家庭结构的变化,使家庭的教育功能、养老功能和夫妻情爱功能弱化。

3. 留守儿童规模巨大,已经形成一个需要予以高度重视的群体。根据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推算,我国留守儿童为2289.2万人。农村留守儿童占本地区儿童的比重高于镇,镇的比重高于市的比重。农村为9.88%,镇为4.91%,市为2.73%。

留守儿童主要分布在人口流动外出的农村地区。从留守儿童的市镇乡构成来看,农村留守儿童占全国的86.56%,镇留守儿童占全国的7.67%,市儿童占全国的5.75%。农村留守儿童人数为1981.5万人,镇留守儿童人数为175.6万人,市留守儿童人数为131.6万人。农村留守儿童是留守儿童的主体。

留守儿童的小学教育阶段在校率和其他儿童没有明显差异,受教育状况良好。但在进入初中教育阶段后,在校率急剧下降。因此,加强和巩固留守儿童的初中教育是紧迫的任务。留守儿童在受教育方面与非留守儿童没有明显差异,在入学适龄儿童入学方面好于非留守儿童,辍学率略高于非留守儿童。

半数以上的留守儿童不能和父母生活在一起,隔代监护和教育现象普遍。留守儿童只与父母一方生活在一起的占43.83%;留守儿童生活在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监护和抚养下的隔代家庭的占留守儿童家庭的比重为20.6%,生活在独身留守家庭的占留守儿童家庭的2.96%。

与流动儿童和定居儿童相比,留守儿童的家庭结构存在明显的差异,主要是生活在核心家庭中的留守儿童比重少于流动儿童和定居儿童,而生活在隔代家庭中的留守儿童多于流动儿童和定居儿童。

4. 人口流动改变了留守妇女的家庭地位。已婚男性流动人口的外出,使众多已婚妇女成为留守妻子,根据人口普查抽样数据推算,全国留守妻子的总量为1 302.4万人。留守妻子的市镇乡分布密度存在明显差异,农村留守妇女的比重和分布密度都高于市和镇。农村留守妻子是留守妻子的主体,是留守家庭研究应该关注的主要人群。

留守妻子的地区分布决定于本地区已婚男性人口流出的几率和流出的模式。我国已婚流动人口以家庭化流动方式为主,是留守妻子比重低于人口流动比重的主要原因。全国家庭式流动的已婚男性占84.34%,单独流动的已婚男性占15.66%。在流动已婚女性人口中,与丈夫在一起的占83.82%,没有和丈夫在一起的占16.18%。

丈夫外出后,留守妻子承担了更多的家庭责任和义务。留守妻子的户主率大大高于流动妻子和定居妻子,56.49%的留守妻子担当了户主角色;留守妻子的劳动参与率也高于定居妻子和流动妻子。但留守妻子户主率的提高,并不意味着她们在家庭中地位的提高,而是家庭分离后“男主外,女主内”的表现形式。

5. 留守老人承担着更重的隔代教育和抚养责任。由于家庭成员的外出,留守老人比非留守老人承担了更多的家庭责任和义务。留守老人由于成年家庭成员的外出,留守老人的户主率在65~73岁高于非留守老人。留守老人的劳动参与程度高于非留守老人4.13个百分点。

从未工作的留守老人和非留守老人的主要生活来源的对比可以发现,留守老人更多的需要其他家庭成员的供养。未工作的留守老人靠其他家庭成员供养的比重为76.18%,高于非留守老人8.18个百分点。

由于子女的外出,留守老人比非留守老人更早地进入了空巢家庭、隔代家庭和单身留守家庭阶段,隔代家庭大幅度增加,留守老人抚育孙子女的负担明显加重。生活在隔代家庭的留守老人比重为10.86%,生活在隔代家庭中的非留守家庭比重仅为2.87%。

6. 人口流动的比率和模式,是影响留守家庭问题的共同因素。如果流动人口全部是以全家一起外出的模式外出,则留守家庭就不会存在。因此,人口流动的程度和模式,是影响留守家庭问题严重程度的共同因素。受“男主外、女主内”等传统概念影响,已婚男性单独外出比率高于已婚女性,是留守妻子比重高于留守丈夫的直接原因。

本书的主要贡献在于利用人口普查抽样数据揭示了我国目前留守家庭及其主要成员的基本状况,并对人口流动模式对留守家庭的形成进行了研究。利用人口普查数据进行我国留守家庭状况的研究,既节省了开展全国性留守家庭专门调查

的费用,也在研究中提高了人口普查数据分析的技术水平。研究的结果为认识和解决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存在的留守家庭问题提供了科学的、有力的依据。这是任何典型性或小规模的调查所无法替代的。

本书的创新之处在于:利用人口普查抽样数据进行留守家庭的研究,充分利用了人口普查中“与户主关系”项目所获取的信息,使该数据的价值得到了应有的发挥。既定量性地研究了留守家庭的特征,也是对人口普查数据的深度挖掘和开发。同时拓展了家庭人口学的研究领域和方法,并通过人口流动对流出地的家庭影响的研究,丰富了人口流动社会影响的研究内容。

需要继续研究的问题是:由于留守家庭是具有国际普遍意义的问题,但由于缺乏足够的资料,没有对这些国家的留守家庭状况进行研究,也没有对国际范围内解决留守家庭问题的共同对策进行对比研究。其次,由于人口普查中家庭户中外出人口的信息不够充分,研究中无法更准确地分析留守家庭成员外出的状况及其对留守者的影响,对问题形成的原因的分析有待加强。

周福林

2006年6月

Preface

Family is a basic unit of society. Proper performance of its educational, economic and emotional functions would exert a great influence upon mental and behavioral development of family members and improvement of their living standard. However, the exodus of family members (usually parents) in the process of China's social transformation, which has resulted in a great number of so-called left-behind families, has proved to be an negative impact up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ldren who have to stay home, caring for the old people, and marital stability and harmony.

The problem of left-behind families has drawn a lot of attention at home and abroad. Special reports could be found in newspapers of 2004 like *People's Daily*, *Guangming Daily* and *the New York Times*. A symposium on education of rural children left behind was held at China's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Demographic Research has started a forum on the left-behind family problem. Whil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social sectors are desperate for a fundamental knowledge of left-behind families, there are, unfortunately, no systematic research available except for a couple of case studies, which cannot be expected to throw light upon the quantitative features of left-behind families in this country.

Left-behind family (or family left behind, or temporary left-behind family) is referred to as a family which has some family members (especially husband and/or wife) absent from home for a long time). It is a special type of family which is formed with some of the family members staying at the initial residence while others depart as migrants. In a sense, it is a left part of a physically disintegrated family. The opposite form of left-behind family is a migrant family made up of people leaving home.

The most important concern about the left-behind family might be left-behind children, old people, wife and/or husband. Left-behind children is defined as a population under 14 who keep on living at their registered permanent residences and whose parent(s) has departed. Left-behind wife is a married woman who stays at the registered permanent residence when her husband has gone out

as a migrant. Left-behind husband closely resembles the left-behind wife. And left-behind old people are those above 65 of age who have to remain at home without being cared by their adult children.

This research of left-behind families was based upon 0.95‰ sample data of the 2000 National Demographic Census (thereinafter the Census), but the sample data of the Census in form of personal records could not be put to direct use. For the sake of investigation, a sample data of population census, with more important information about the familial structure of a household, and wherefrom data of left-behind children, wives, husbands, the aged, wife-husband ratio, and living conditions of married women's children were derived, was created on the basis of the original census data. In addition, the background to the national demographic census of 2000 was reviewed. The author has participated in the fieldwork about left-behind families on separate occasions.

This dissertation falls into 10 chapters: 1. Subject selection and its implications; 2. Literature survey and related theories; 3. Conceptual and theoretical framework; 4. Data resources and methodology; 5. Familial demographic study of China's left-behind families; 6. China's left-behind children; 7. China's left-behind wives/husbands; 8. China's left-behind old population; 9. Left-behind families in perspective of familial functions; 10. Conclusions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Data analysis leads to some principal conclusions:

1. Left-behind families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type of family in China's socio-economic transformation

Left-behind families, which account for 20% of Chinese families nowadays,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type of family in China's socio-economic transformation. They would be much more influential upon both individuals and society than incomplete families(single-parent families, for instance).

2. Left-behind families are characteristic of varied family structures and weakened familial functions

The economic function of left-behind families has been strengthened in the pursuit of social and economic interests, whereas the absence of essential family members and resulting changes in family structures have impaired family's role in educating children, caring for old people and increasing conjugal affection.

3. Huge number of left-behind children have made up a group in need of much more atten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data from the Census 2000, left-behind children in China are estimated to be 22.892 million. The proportion of the left-behind children in a rural part to the total children in that area is bigger than the proportion in towns is bigger, and a similar result could be found in a comparison between towns and cities (rural areas: 9.88%; towns: 4.91%; cities: 2.73%).

Left-behind children a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rural areas undergoing the exodus. The left-behind children in rural areas, towns and urban areas represent 7.6% (19.815 million), 7.67% (1.756 million), and 5.75% (1.316 million) respectively of the total in the country. Thus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constitute the main body of left-behind children.

Although no remarkable differences in school attendance ratios could be identified among left-behind children and other children in the stage of elementary education -- almost all of them can have a good education, a sharp decline in the number of school-goers among left-behind children can be observed in junior middle school. It seems that some immediate initiatives should be taken to improve junior secondary education of these children. As to academic performance, left-behind children are not apparently different from non-left-behind children; but their school-dropping rate is a bit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latter.

Over half of left-behind children can not live with their parents, due to which grandparental guardianship prevails. Of the total population of left-behind children, those who live with a single parent represent 43.83%, those who are looked after by their grandparents represent 20.6%, and those who stay home alone amount to 2.96%.

Compared with children who live an itinerant or settled life, left-children usually have a differently-structured family. In other words, more children living an itinerant or settled life tend to be found in a nuclear family than left-behind children, while, in turn, more left-behind children are living with their grandparents than mobile or settled children.

4. Population mobility has changed the status of left-behind women in family life.

Married men's departure from their registered residence has turned many

married women into left-behind wives. Estimated according to the sample data of the Census, there are about 13.024 million left-behind women all over the country. Left-behind females, who are more densely distributed in the countryside than in towns and cities, and who form a bigger percentage of the total local female population than those in towns and cities, make up the main body of the females left in the rear. They need more attention of family study.

The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left-behind wives depends upon the ratio of transient married males and the patterns of their emigration in a particular region. The transient married population in China is suggestive of familial mobility, which largely accounts for the lower ratio of left-behind wives in contrast to that of mobile population. In China, married males emigrating with their family represent 84.34% and single transient married males represent 15.66% of the total transient males. Among married female migrants, those traveling with their husbands represent 83.82% of the total, and those going alone represent 16.18%.

In the absence of their husbands, wives left behind tend to assume more duties and responsibilities for the family. 56.49% left-behind wives act as the head of the household and they have got higher participation in working than nomadic wives or wives with their husband's company. However, rather than implying that left-behind wives have begun to enjoy a higher status in the family, this seemingly great improvement in their social status actually presents a new version of the tradition "Husband are responsible for external affairs while wives for household matters."

5. The old people left behind usually act as the guardians of their grandchildren

Compared with other old people, the left-behind old tend to assume more familial duties and responsibilities. There are more left-behind old people aged between 65 and 74 acting as the head of households, than other old people. And their participation in laboring or working is 4.13 per cent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non-left-behind.

A comparative investigation of the main sources of income for left-behind old people and other old people indicates that more left-behind old need supply from other family members. The percentage of the old left behind who rely upon the supply by other family members is about 76.18%, 8.18%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non-left-behind old.

With no adult children nearby, left-behind old people are more likely to live either alone or with their grandchildren or with only one adult child (or child-in-law). There is a sharp increase in left-behind families consisting of only grandparents and their grandchildren have, which in turn puts much more burden on the shoulders of the old. The percentage of the left-behind old living in families managed by grandparents is 10.86%.

6. The ratio of transient population and the pattern of population movement have combined impact upon the issue of left-behind families.

There would be no families left behind if population movement steadily followed the pattern of a whole family emigration. Hence the extent and the pattern of population movement are bound to shape the problem of left-behind families in a combined way. The tradition of "Men should manage external affairs while women have to learn managing internal affairs" is responsible for higher proportion of emigrating of married men to married women.

The major contributions by this research are offering some basic knowledge of China's left-behind families and main family members, and investigating the patterns of population movement, by utilizing the sampled data of the Census. Such utilization of the Census findings not only has helped to cut down the budget directed at a national investigation of left-behind families, but also improves the technologies for data analysis for the census. Research findings provide a scientific and forceful basis for understanding and resolving the problem of left-behind families in China's social transformation, which might be irreplaceable by any typical or small-scale studies.

The novelties of this research might be: It makes the best use of the sample data of the Census, especially the data material drawn from the Item "(interviewee's) Relationship with Head of the Household." Where a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study is conducted about the features of left-behind families, development and efficient application of the Census data is promoted. Meanwhile, it extends the research field and methodology of family demography, and contributed to the research of social impact of population movement.

Still, there are some aspects deserving more research effort. First, the researcher's further study of left-behind families in other countries was discouraged